

# 经济转型开好头 制度变革要跟上

政府工作报告不仅阐明了十二五期间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还提出了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以及相关任务。我们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完成将有利于为十二五规划指明的经济转型方向开个好头，但是要想使经济转型迈入可持续的内生发展道路，仍需要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实施更艰巨的制度变革。

陈伟

## 平稳增长有利结构调整

尽管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五年年均增长7%，但政府仍将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8%。我们认为，这可能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挑战，但在目睹了2009、2010年中国经济较快的复苏路程之后，中央确信当前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还没有削弱，我国经济增长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当前有着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

其次，维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也是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如当前结构调整的许多措施不免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速，典型的如房地产调控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都会明显拖累经济增速，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平稳的态势，类似房地产调控这样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同样也很难推进；再如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社会阶层利益调整的一个过程，如果不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速，创造较多的物质财富来弥补结构调整受损方利益的话，结构调整就会遇到巨大的阻碍，若在没有创造一个快速增长的内需市场前，众多出口

企业向内需市场的转型就难以成功。

此外，维持十二五初期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可为后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放缓减少增长压力，从而比较容易实现十二五年均增长7%的目标，为今后结构调整的深入腾挪空间。如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老龄化人口比例较快上升等劳动人口“红利衰减”现象将使得十二五后期内增长潜力放缓的可能性较大，若能在十二五初期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就可以更从容应对今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挑战。

## 民生改善为“转变”之本

应该看到，有了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形成良好的增长态势，2011年政府保增长的压力实际上是减轻的，这也是今年财政赤字总量减少1500亿元的原因，各地或各部门也可以适当减少经济方面的压力，真正花更大精力落实中央提出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中央政府也比以往提出了更多数量的约束性要求和指标来督促各地或各部门实施民生改善工程。

针对民众反映最强烈的物价问题，

政府从以下多个方面赋予有关部门调控物价的责任和义务：有效管理市场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货币条件，这意味着在当前货币和贷款增速目标的实现仍有一定距离，央行短期仍将延续前期的紧缩力度，加息或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可能；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全面加强价格调控和监管，这意味着在中上游价格传导压力较大、社会通胀预期较强的情况下，政府很可能动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实施类似2008年初那样的短期价格管制。

民众最关切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政府也将在2011年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它们包括：降低所得税门槛，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级次级距，这显然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个税免征额提高，可以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整体获益程度更大；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些要求已经在各地得到普遍实施，最低工资提升比例大都在15%以上。

各类关系民生权益保障的政策也有望在2011年得到强化。如针对部分地方政府无视农民权益，而过度追求城镇化率提高，中央政府要求各地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今年财政支出的更多部分将用于各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它们包括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从2010年的24%的县扩大到全国40%的县，解决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的历史遗留问题，确保今年医改攻坚年各项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等；以问责制的机制赋予地方政府遏制当地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责任，以签订“军令状”的形式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义务。

## 制度变革需要给力

可以预期，在较强的中央政府约束下，今年各地的民生事业会有较大的进展，民众的生活幸福感也有望一定程度提高；但这些成果只是初步的，原因在于：这些促进民生改善的政策仍主要侧重于技术操作层面，在没有从制度层面上建立各地民生保障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它们的政策实施效果将难以有持续性。如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源，来自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竞争原则在生产领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由此决定了分配领域的不合理。再如当前地方政府难舍“GDP情结”、轻视民生投入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考核机制和广大民众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正当机制。这些问题都不是靠政策可以解决的。

值得赞许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制度痼疾，并在十二五报告中给予了明确指示，如报告要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

我们期待着这些制度变革能在十二五期间尽快开启实质性“破冰”之旅，而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当前已经严重制约经济转型的社会领域变革，从而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向“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模式。

(作者单位：民族证券)

■ 专家论道 | In-depth Comment

# 谨防输入型通胀的双重效应

马涛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今年上半年我国通胀势能依然强劲，尤其输入型压力显著。笔者认为，实现今年CPI增长4%目标，应积极建立削弱通胀向国内输入的机制，谨防输入型通胀的双重效应：一是受世界经济复苏加快以及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影响，原材料、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或将给我国物价带来“叠峰效应”；二是国际通胀压力趋向长期化，或将对我国通胀形成“发酵效应”。

## 国际通胀环境的“发酵效应”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价格体系差距。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加快，在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大环境下，客观上要求这些新兴市场国家补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价格差距，所以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较高通胀率会是一个长期趋势。这可能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与国际市场接轨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享受全球化利益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短期内这种局面难以有效改观，“印钞机现象”将与输入型通货膨胀长期并行。国别货币充当世界储备货币给货币发行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尤其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利用中心国的地位向外围国转嫁危机，通过输出通货膨胀掠夺财富，来换取自己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

20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建议得到实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这种财富转移策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日等中心国一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妄图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胀预期来摆脱国内通货紧缩，然而国内实体经济不给力，其他国家和地区复苏步伐较慢，诱发嗅到利益腥味的“货币洪灾”猛烈冲击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堤坝。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的情况下，要给市场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信号，而不是按照市场想象的空间和幅度来调整汇率，使市场相信政府捍卫汇率政策自主性和稳定性的决心。

要建立外汇、能源、战略物资等综合储备体系，尤其是增加石油、煤、钢材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储备，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价格波动，政府可以动用相应储备，平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冲击。

## 输入型通胀压力渐趋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提高，我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体现在各主要大宗商品上，原油逼近55%，铁矿石达到60%，大豆接近80%，棉花超过30%，决定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渐

趋刚性，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通过国际贸易、货币供给、成本传导等途径，对我国物价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经济结构失衡是通货膨胀向国内输入的隐患，而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很多积弊，经济结构失衡严重，原材料、能源资源以及粮食等结构性短缺，在国内供给无法有效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进口调节平衡。但是，当国际市场上我国进口需求占据绝大部分的原材料、能源资源以及粮食价格上涨时，国内市场上与这些商品相关的上下游产品价格攀升，导致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传导和扩散。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管住货币意味着抑制通货膨胀成功了一半。但是，在我国控制货币供给面临很大困难，基础货币投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占款，这些高能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放大将演变成巨大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维持规模较小的外汇储备，减轻外汇占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压力，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汇率风险面前几乎赤手空拳，最后有可能在国际货币危机的狂风骤雨中被卷走一切。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能暂时选择忍受流动性泛滥的代价，付出治理通胀的高昂成本，来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多管齐下 治理输入型通胀

治理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胀，必须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与国内物价上涨相互叠加，预防国际通胀环境的“发酵效应”，以免造成通胀的持续压力。我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平稳运行，这是阻断通货膨胀向国内输入的根本途径。继续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外汇占款的投放，将汇率政策纳入到货币政策框架下使之从属于货币政策，注重对外汇储备的预测来加强基础货币调控，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对汇率失调给予足够重视。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劲的情况下，要给市场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信号，而不是按照市场想象的空间和幅度来调整汇率，使市场相信政府捍卫汇率政策自主性和稳定性的决心。

要建立外汇、能源、战略物资等综合储备体系，尤其是增加石油、煤、钢材等重要物资的国家储备，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价格波动，政府可以动用相应储备，平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冲击。

在国际上，我们要尽力遏制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滥发货币的道德风险，敦促各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切实维护自身货币稳定，以便从源头上削减、消除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这就需要不断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中的地位，增加我们的话语权，竭力遏制美、日等国转嫁经济危机的行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 “向我加税”不如盛世减税

雷泓霖

“向我加税，放老百姓一马！”3月4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辉煌体育用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甘连舫谈到个税免征额问题时说：“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这还没算年底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

“向我加税”，这种声音是充满了体恤意识和苍生情怀的。但就算是此提案得到落实，通过制度上的“劫富济贫”缓解收入差距，仍非治本之策。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研究室主任赵萍说：“我们的高税收把国外很普通的商品人为变成了‘奢侈品’，这是中国消费者的不幸。”因为消费税等提高了物价成本，比如茅台酒等诸多商品，在国外的价格比在国内便宜很多。

据悉，消费税调整有望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现。减免赋税能有效降低物价，扩大内需，抑制通胀，激活国内的消费市场。一举三得，比“向我加税”更有操作和公平意义。



场外市场要发展，万众瞩目新三板。融资多元可进退，层次丰富能转换。模式创新靠智慧，运行看好凭监管。择机推出君莫急，好事来临总姗姗。

焦点 评论

■ 元来如此 | XiaoGuoyuan's Column

#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糊涂账



肖国元

笔者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缘于日前关于广州亚运会经济账该如何算的争论。据媒体报道，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投入资金从最早预算的20亿元飙升到后来的2500亿元，其中1900多亿元是广州自己承担。在今年的广州“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对此提出质疑。

针对外界的质疑，广州有关部门的回

应是，亚运会开支不仅包括直接开支，还包括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虽然数量庞大，但对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乃至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是的，谁也不会怀疑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会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不过，如果依照上述逻辑，我们可以认定，所有的投资都会产生类似的作用。因此，对这样的事挑三拣四纯属多此一举。沿着这样的逻辑再推演下去，我们可以说政府的所有投资都是合情合理的，都会产生效益——即使经济效益不好，也会有巨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环境效益，乃至政治效益等等。可是，事情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公司化运作，一个项目、一项投资的经济账很好算。收入减掉成本就是利润，盈亏一目了然。但是，有些项目，尤其是公共支出，就难以用确定的收益来衡量，经济账没法算。于是，社会效益就“顶班上岗”。人们通常以社

上，也只有美国人尤伯罗斯首先开先河，成功帮助美国举办了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创造了2.25亿美元的盈利，把奥运会变成了摇钱树。但“精打细算、减少支出”的基本原则则被普遍遵循。

近几年来，我们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与亚运会。2011年大运会也将在深圳举办。这几次大型活动的总投资，包括直接的与间接的，估计超过万亿人民币。这样大规模的投资何为合理，何为合算，是不会有精确答案的。因为不是公司化运作，支出虽然一清二楚，但收益无从计量，而且技术上许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确实难以衡量。不过，这些支出是以税收为基础的，庞大的开支必然占用巨量的财政资源。而且理论上，政府的大手大脚往往会落入低效率陷阱，远远不及这些钱在民众自己手中来得有效率。所以，对于类似活动，基本的经验是压缩规模、减少支出，以避免“公地悲剧”。我们希望类似广州亚运会这样的重大项目不要留给后人一笔糊涂账。

##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